

王志華 著

大系統價值學說

政治經濟學的變革

香港國際政治經濟出版社

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等于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只有超過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

序

①

鄒東濤

當我讀完王志華同志這本書稿時，感到手中寫序的筆有些沉重。因為這不是為一本一般的闡釋性的經濟學書籍寫序，而是為一本探險和創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寫序。

—

1985年春，我到廣州參加了“全國中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改革理論研討會”，在提交給該會的論文《改革中的理論和理論的改革》及其與會發言中，提出了以下幾個觀點：

- 理論再也不能跟在實踐后面爬行；
- 對“基本理論”也要進行再認識；
- 要破除對馬克思的“兩個凡是”；
- 創新一改革時代理論家的基本任務；

① 鄒東濤，著名經濟學家，博士研究生導師，現任中國體制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長。

●探險—理論家應具備的基本素質，等等。

我深深感到，這本著作較充分地體現了上述特色。更為可貴的是，它充分反映了這位“行伍”出身的業余研究者的理論創新精神和探險精神。

當你讀了作者下述觀點之后，或許你認為作者是“離經叛道”，從而使你“義憤填膺”；或許你認為作者是“標新立異”，甚至是“異端邪說”；或許你認為作者是“輕浮草率”，治學“極不嚴謹”。然而，你不得不承認，作者是以一種大無畏的勇氣重新改寫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及其理論體系：

●勞動價值論存在着嚴重的缺陷；商品價值的實體不是社會必要勞動的凝結，而是商品功能對於人類生產生活需求所產生的作用；

●資本不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而是建立在科學技術基礎上的實實在在的物質生產力。資本無罪，資本生產無罪；

●剩余價值不是無償占有工人剩余勞動的產物，而是科技發展的產物；

●僱傭勞動并不是必然等于剝削，而是資本協作的形式之一；

●剝削的根源并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剝削的本質是主權剝奪。剝削形成于極端的自由競爭；

●生產力不決定生產關係，傳統論點在整個人類發展史上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人類歷史上不存在“母系社會”，原始群落的首領是在競爭中由強者決定的；

●“原始共產主義”是一種沒有科學依據的猜想，等等。

以上觀點的論述和證明，盡管存在着不充分、不完善的地方，但卻為我們對傳統理論進行重新認識展示出了種種新的思路，為傳統的思維定勢的革新打開了一扇扇窗戶。

二

就本書旗幟鮮明的理論觀點來看，確實有點“異端”了。然而，在人類思想理論發展史上，包括經濟科學發展史上，“異端”却往往成為科學發展的新契機，當“異端”被人們認識并被實踐證實之後，也就成了正統，這種正統又可能被後來的“異端”所打破。從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人類思想理論科學的發展史，就是“異端”的不斷推進史。不用說是社會科學，就是自然科學也是如此。例如，“日心說”在歷史上就曾是一種“異端”，這種“異端”在取代“正統”的“地心說”中就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其間發生了“日心說”的宣傳者布魯諾被處火刑的悲壯事件。

改革的時代，是我國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科學大發展的年代。一方面，原有的理論體系與改革的現實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反差；另一方面，改革的豐富實踐不斷呼喚着原有理論體系的創新和發展。

然而，在我國，由于種種原因，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比實踐的創新和發展難度要大得多。

比如，較早“下海”的人，不僅個人取得了豐厚的收入，而且也為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成為新體制的開拓者和新時代的弄潮兒；而較早在理論上主張并宣傳中國要實行市場經濟的人，則大多受到種種責難和批判。較早創辦個體、私營經濟的人，大多成為大款，過着非常優裕的生活，他們中的一些典型人物，還被選拔為各級人大和政協的代表參政議政；而較早在理論上主張和宣傳在中國要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人，却給自己帶來了不盡的麻煩，并且大多與清貧為伍。在這種強烈的反差和對比下，誰還願意為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去努力、去奮鬥呢！

中國的出路在於改革，而改革需要理論的科學指導。然而，理論並非處處走在改革的前面，科學地指導改革，而是往往處在被動地“應戰”地位，跟在改革的實踐後面艱難地“爬行”，“實踐中行得通，理論上說不通；理論上說得通，實踐中行不通”的現象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越來越普遍、越嚴重，形成了“實踐步步為營，理論節節敗退”的局面。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傳統理論“剛性”太強，對於豐富多彩、瞬息萬變的社會經濟實踐漠然視之，固守書本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

這些年來，我國理論界也出版有不少“新學說”、“新理論”、“新探索”之類的書籍，但讀過之後，實在不敢恭維有多少“新”意。如果有什么“新”東西，不過是對舊房子的某種形式的新裝修而已，或者說是對某堆積木的新堆砌組合而已。盡管我們也一直在高喊理論研究要創新、要發展，但實際上，則處於一種“創而不新，發而不展”的狀況。當然，這絕不是我們的理論工作者不願意和沒有能力去創新、去發展；我們的出版工作又何嘗不想多出版具有創新和發展意義的理論著作呢！問題在於，我們未能給我國的理論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三

多年來，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分為兩個部分：基本原理與具體理論，或核心理論與外圍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和發展，似乎只是對具體理論或外圍理論而言，而基本原理或核心理論則是永遠不能觸動的禁區。凡是禁區，同時也就是險區和“雷區”。有多少人願意或者能夠去探險和“觸雷”呢？

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和發展，既應包括具體理論或外圍理論，也應包括基本原理或核心理論，而且後者還有着更加重要的意義。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封閉起來，就會使它成為教條

主義的“避難所”和“藏身地”。這不僅從根本上堵塞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道路，更重要的在於，它往往成為改革的實踐不可逾越的屏障。我們在改革實踐中常常遇到的理論難題，一般並不在於馬克思的個別結論，而在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所採取的僵化態度。

一個最普通的基本常識是，地圖是根據地球表面的客觀地理情況繪制的。地理科學的研究發現，地球表面的大陸是一個緩慢漂移的板塊結構，到若干萬年之後，大陸結構的形狀改變了，如果我們還繼續使用現在的地圖，豈不是天大的笑話。當地圖不符合地形時，要修改的是地圖，而絕不是地形；當理論不符合實踐時，應當修改的是理論，而不是實踐。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歷來反對把他們的理論看作是“最終規律”，“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而我們在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時，恰恰違背了他們的遺訓，把基本原理當作不變的、永恒的真理。無論社會實踐怎樣發展變化，無論改革開放怎樣深入進行，似乎基本原理永遠是“萬古常青”的，永遠能夠“以不變應萬變”。一方面，我們反復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另一方面卻把基本原理排除在外，不僅不受實踐的檢驗，反而還成了評判實踐的“最高法官”。

多年來，我們在理論研究中，形成了這麼一種範式：不是用豐富的實踐去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總是習慣於運用基本原理去“闡釋”實踐。這樣，就把社會科學變成了單一的“闡釋學”，把社會科學家變成了單一的“闡釋家”。當實踐的發展客觀上已經突破了某些基本原理的屏障時，就採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態度。當某個領導出來說了話以後，於是某個“基本原理”就變成了“個別結論”而不再維護。這差不多成了我們許多理論家的思維定勢，即便是某些在改革開放中思想解放的同

志，也往往逃不出這種窠臼，一方面對現存的不合理因素極為不滿，積極倡導革新鼎故；另一方面，又對形成這種不合理因素的理論根源懷有深厚的“感情”，不容許越雷池半步，形成了一種內在的思維和行為的矛盾，以及改革發展的願望和理論上感情色彩的矛盾。

四

本書的作者，一反我國理論界的這種思維定勢和理論研究窠臼，跳出上述內在矛盾性，從新時期的改革實踐出發，以探險精神觸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雷區”，試圖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理論體系。

衆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成熟的”、“穩定的”理論體系，它的理論基石是“勞動價值論”，它的主要內容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剩餘價值理論”。恩格斯把“剩餘價值理論”與“唯物史觀”相并列，作為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個偉大發現。顯然，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核心內容。過去，我們對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否定和批判，無不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礎上；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各項經濟政策，包括價格政策、分配制度和國民經濟統計核算方法，都無不與這一理論密切相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踐與勞動價值論發生着多方面的矛盾和衝突。我們未能對原有的理論進行深刻的反思，而是採取“兩股道”行車的辦法。一方面，在改革的實踐中，我們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只要有利于發展經濟的措施，我們都盡可能採用。例如，在分配方面，我們突破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按勞分配的局限性，發展了多種形式的分配制度，客觀上承認了非勞動因素（如土地、資本、設備、風險等）對價值的創造；在國民

經濟核算統計制度方面，取代了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東方核算體系——“物質產品平衡體系”（MPS 體系），實行了過去批判多年的西方核算體系——“國民收入帳戶體系”（SNA 體系），以及建立在這個核算體系基礎上的新會計制度；在價格制度方面，我們逐步改革了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科學的”國家定價制度，而把價格推向市場。

另一方面，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以及相應的思想理論教育方面，却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有的理論體系進行，從而形成經濟理論與改革實踐脫軌的現象。以致於一些比較熟悉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人，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却力不從心。有許多專門學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生、並且成績優良者，在分配工作時，實際經濟工作部門不願接收，認為這些人只具有能供“大批判”武器使用的、“空洞的”理論知識。這些人在工作實踐中也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學到的東西沒有用，需用的東西沒有學，而最有用的東西則往往是那些在學習中作為批判的內容。

這種情況在先於我國改革的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類似的反映。許多東歐學者說，要想在經濟實踐中富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就應該徹底忘掉在書本上所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波蘭著名經濟學家布·明茲著《現代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要求徹底摒棄舊理論的所有論斷，因為它們不能解釋現代（經濟）體系的本質和當前進行的經濟過程的本質。”“如果錯誤的理論不被徹底摒棄，那就會成為這一新理論發展的嚴重障礙。總之，不應讓死的東西去妨礙活的東西的發展。”^①

社會經濟實踐對經濟科學創新和發展的推動作用，比一大批經濟學家埋頭讀書對經濟科學創新和發展的推動作用要大得多。從本書的分析論述過程來看，顯然不是作者從書本到書本、從概

^① 布·明茲《現代政治經濟學》，東方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 頁

念到概念、苦思冥想演繹出來的結果，而是通過對我國經濟改革新實踐進行深入分析研究后，上升到理論高度的思想結晶。

五

像這樣一本充滿着探險精神和創造性思維的經濟學著作誕生于一位廣東青年作者之手，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這是因為，十多年來，廣東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沿陣地和排頭兵，豐富的、超前的實踐必定創造出豐富的、超前的經濟理論。

近兩年來，社會上存着這樣一種說法：“廣東人只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子。”我看這句話就有點偏頗不公。我今年春季在廣東講學時，就專門就這種說法談了自己的觀點。我國自近代社會以來，在廣東產生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們的思想理論建樹和社會政治活動對中國發生過極大的影響。就現代經濟科學來說，在 30 多年前，廣東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卓炯先生就提出了要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被公認是我國最早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人；80 年代初，這位老學者又對剩餘價值理論提出了新的見解，一度引起了強烈反響。今日王志華的這本著作對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以及其他理論的分析和新的見解，其視野和深度顯然在卓老之上。這是廣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發展的客觀反映，也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客觀規律的反映。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說過，新的時代正在呼喚着新的“孔子”，新的“孔子”必定出現在中國。我看，只要廣東的改革和發展一直走在全國前面，還會誕生出新的“康”、“梁”和“孫中山”。

本書作者王志華同志並不是“科班”出身的專業研究人員，他原有文化程度僅是初中，在邊防部隊服役 20 年，其中 8 年在前綫戰爭中度過，並立過多次戰功。他完全靠自學成才，曾對多

種學科進行了研究，今日又寫成了這本創新和探險型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其花費的精力和心血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沒有對祖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事業的赤誠之心，是根本做不到的，其可嘉精神不得不為之稱道。

六

作為曾經是《資本論》研究生畢業的序者，深知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龐大深邃，尤其是價值理論，歷來就是一個高深的理論問題，國內外學者長期以來就存在着爭論，並提出了各種不同的價值學說。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實踐的大發展對原有的理論體系發生了種種矛盾沖突，客觀上要求對其進行一場革命，但要完成這一革命性任務並非易事，本書則對此作了積極的、勇敢的、開拓性的貢獻。

筆者對本書作了高度評價，但並非認為本書就徹底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革命（這一革命恐怕需要經過全民族一個較長時期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也無意通過一篇“廣告式”的序言（有些書的序言就是如此）要求讀者完全接受本書的觀點和理論體系而輕易地不相信或拋棄其他的觀點和理論體系。而是認為，任何讀者都可以通過閱讀、比較和鑽研，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各種不同的見解既互相論爭，同時又互相尊重，互相容納，做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而促使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能夠形成不同的學派，共同促進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這篇序言對本書的理論分析過程沒有作更多的介紹和評價，而把這一任務留給讀者去進行，就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

筆者認為，我國在從封閉時代邁向開放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在新實踐、新事物、新思維、新觀點的不斷發展中，一種具體的

理論觀點的突破或某個基本原理的創新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培植一種敢于探險的國民品格，就好像勇士們敢于去首漂一條江河和敢于去首登一座險峰一樣。

要學術研究沒有風險，必須使學術研究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尤其需要有對學術研究自由的法律保護。但我國正處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之中，百業待興，百弊待改，各方面法制的健全有一個歷史過程，人們對學術研究自由的認識也有一個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就難免會發生對正常學術研究、特別是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干擾和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具有探險精神。

“無限風光在險峰”。理論是在創新中發展的，而創新是在探險中實現的。理論創新的最大成果和希望往往存在于險區當中，越是大險區，越出大成果。如果說，創新是理論發展的杠杆，那麼，探險則是這根杠杆的支點。科學家認為，懷疑是創新的起點，我則認為，探險才是創新的真正行動。缺乏懷疑精神的人在真理碰到鼻尖時也會被放過去，而若沒有探險精神，即便是有了創新的火花，也只能壓在心底而不能迸射出來。探險精神是理論家應具備的基本素質，這種素質比理論家本身的知識和智力更為重要。那種“頭頂安全帽，腳踩西瓜皮”的人是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有作為的理論家的。但願我國的理論家都能成為敢于創新和發展的探險家。

這就是本篇序言的精神實質所在。

1993年8月于西北大學

導 論

中國向何處去？社會主義向何處去？改革開放向何處去？這是中國公民們都在思索的問題。很長時間內，人們的認識與實踐總是在十字路口徘徊。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講話，精辟地分析了當前的國際和國內形勢，科學地總結了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基本實踐與經驗，明確回答了多年來經常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思想認識問題，澄清了姓“資”姓“社”等理論是非。要求思想更解放，膽子更大，步子更快，抓住機遇再上新臺階。指出中國的出路在於擴大改革開放，“其它的路都是死路”。從而堅定了全國人民改革開放的信念，掃除了觀念上的重重障礙，為徘徊于十字路口上的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為標志，中國的改革開放向縱深大步挺進，進入了新階段。

然而，這個局面來之不易。盡管中國的改革開放朝着預定的方向前進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前進的道路總是存在不少障礙，不時出現左右干擾，有時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問題的症結究竟在哪里？這其中有許多問題值得深思。

十分可喜的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作為大會的主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繼承鄧小平同志的遺志，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從而堅定了改革開放的信心，保證了中國發展前

進的正確方向。

一、改革呼喚理論

改革開放絕不僅僅是個實踐問題，更重要的是個理論問題。思想僵化是改革開放最大的障礙，不改變觀念，改革開放就不能變為自覺的行動。盡管大勢所趨時，人們都一致表示擁護緊跟，但一有機會，其中就會有不少人跳出來橫加指責，對改革開放進行干擾。盡管目前改革開放的呼聲相當一致，但如果不是從本質上充分認識改革開放的意義，就很難說今后可以一帆風順。因此，鄧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更新觀念，呼喚人們“換腦筋”。

“換腦筋”不是件簡單的事，不是靠權力和權威幾次號召就能達到目的的，必須在理論上產生重大的系統的突破。一切事物的發展從來都是有立才有破，而不是先破後立。只有新的理論、新的事物出現之後，舊的理論與事物才可能被破除。否則即使破除了一個舊世界，所建立的不一定是本質上的新世界，而可能只是形式上的花樣翻新。新觀念、新事物一經出現，舊觀念、舊事物就自然處在破除之中，立新才能破舊。因此，“換腦筋”必須建立系統的新的理論架構。

改革的實踐過程，本身就是對傳統理論的挑戰。傳統經濟模式的失敗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從正反兩方面對傳統理論進行了檢驗，同時也充分證明了改革開放新觀念的正確性。改革在實踐上走在歷史的前頭，而理論研究卻還很不適應改革實踐的節奏與步伐。鄧小平關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建構是改革開放的基本指導思想，在這個基本指導思想之下，應該產生一系列系統的具體理論來指導實踐。可是客觀上，目前遠遠達不

到這個要求。應該說，十多年來的理論研究產生了不少重大突破，解決了許多重大課題，但需要解決的問題遠遠比已經解決的問題要多得多。

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許多新事物，在經典理論中，都是與資本主義劃上等號的，被批判了一個多世紀，而實踐證明是科學的。這就要求我們從理論上作出深刻的解釋。現在已確定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經濟體制進行了根本改造。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指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都是經濟手段。”從理論深度上把市場經濟從姓“資”姓“社”的旋渦中解脫出來，還其歷史面目。但還有許多理論問題需要作出進一步的回答。比如，目前廣泛實行股份制，這就涉及到按產權股份分配利潤的問題，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了按生產力要素分配的論點，從而肯定了按勞與按資分配的地位，確定了產權利潤的正式“身份”。那么產權利潤是不是對剩餘勞動剝削的產物？可以肯定，產權利潤並非對剩餘勞動的剝削，那么其原理又是什么？諸如此類的問題如果說不清楚，那么在頑固的傳統觀念面前就缺乏說服力。然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之所以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在“社”與“資”的問題糾纏不休，正因為傳統理論給許多重大問題都貼上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標籤，把屬於客觀科學的許多問題，如價值規律、商品、利潤、商品經濟、自由市場等都納入階級學說的狹隘偏見之中，一概冠以資本主義的頭銜，與剝削制度劃等號，予以全面批判與拋棄。長期的灌輸式強化訓練又使得人們習慣於按標籤論是非。凡事只看標籤是什么，而不看內容本質是什么，人雲亦雲。當有人提出新的見解，或有逾越雷池之舉時，這種“標籤觀念”就會條件反射般出現本能的反對。“標籤觀念”正是改革開放的巨大障礙，而我們恰恰還不能從本質上作出深刻有力的回答，因而儘管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大家都表示緊跟，而思想深處是否深刻理解則很

難說了。事實上許多人的認識仍然是似是而非，模糊不清，認為改革開放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有人在。改變觀念仍然是個艱巨的任務，其關鍵則在於理論上的系統突破。

解放思想，一方面要求勇于冲破傳統理論教條的束縛，從傳統理論的歷史標籤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要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之下勇敢地、實事求是地對傳統理論進行分析論證，建立系統的理論新建構。這是改革開放所面臨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忽視基礎理論的研究，這是理論研究的一個重大弊端，而目前最致命的正是基礎理論的薄弱。應用理論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正確的基礎理論的指導，就很難保證應用理論不產生偏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基礎理論是個敏感的課題，一般人不敢輕易去碰，因而只有等高層領導提出后才敢打打擦邊球。更為可悲的是“寧左勿右”的觀念依然被不少宣傳、出版部門的人士當作護身符，凡是與經典理論相左的論點，盡管他們也覺得很合乎實際，很有科學性，是當前改革所必需的，但只要沒有大人物肯定，他們就只有拒之門外。

二是缺乏系統的整體攻關，傳統價值學說的局限性人們早有所知，提出過這樣那樣的質疑，但因為缺乏系統的整體攻關，事實上無法產生系統的理論突破。即使有所突破也是一些枝枝葉葉，無關宏旨。目前有兩種片面的傾向，一種是既要堅持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傳統理論，試圖從傳統理論中找到改革開放的依據，用傳統理論為現行改革政策作注釋，這顯然是徒勞的。既然是改革就不可能從傳統理論中找到依據。否則就不叫改革。我們說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正是以其實事求是和發展的觀點來看事物，而非照搬其具體經濟理論；另一種傾向是只顧搞應用理論，大量吸收引進西方理論，對基礎理論不予深探，保留基礎與應用

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事實上存在着基礎理論的空白點，應該說這是一大缺陷。這也正是一些人用以攻擊改革開放姓“資”的借口。

二、勞動價值論面臨挑戰

勞動價值論一直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學說，過去我們曾給予至高無上的肯定，甚至當作絲毫不可更改的教條來崇拜。然而，不僅勞動價值論從形成到發展的過程始終存在非議，而且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更加面臨無情的挑戰。應該承認，勞動價值論有其科學的成份，具有不少單方面的理論價值，但作為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已經不能成立。勞動價值論的嚴重缺陷已為多數學者所共識，修正、發展勞動價值論已成為普遍的呼聲，並有不少學者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價值學說是經濟學的基礎。不同的價值學說對價值實體、價值源泉、利潤源泉等有不同的解釋，進而導致商品交換、價值分配、社會模式的不同原則。因此，價值學說的正確與否，最終將導致社會經濟運行方式和社會發展模式的正確與否。傳統的經濟模式及社會制度的設計都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推演出來的產物。而數十年的實踐表明，其結果是不理想的，明白無誤地表現出其主觀理想化，與客觀規律相悖。這一切歸根結蒂是勞動價值論的嚴重偏差所導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客觀上是對勞動價值論的挑戰。

勞動價值論是在科學技術與思想方法尚未充分發展的歷史時期的產物，是一種以直觀經驗為基礎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儘管是有一定歷史時期的進步學說，但從思維方法到結論都受到歷史的局限。可以說是一個科學課題的歷史開端，但還不能說這個課題已

經完成，研究表明並沒有達到真正揭示價值本質、利潤本質的目的，由此而推導出的對資本主義運動規律及剝削原因的揭示尚未達到本質的突破，因而事實上我們對私有制弊端的認識並不深刻，對歷史發展規律的看法及對未來社會模式的設計不無偏頗。相反，對許多客觀的科學本質作了錯誤的批判和拋棄，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

勞動價值論之所以受到挑戰，第一，表現在對一些基本概念の忽略。比如，什麼是價值？什麼是勞動？什麼是創造？等等，這些問題並無科學的定義。就價值而言，價值的本義究竟是什麼，至今為止仍無揭示。價值的本義實際是物質或事物對於一定對象的需求意義，簡言之，就是“供需意義”。有供無需或有需無供都不構成價值。脫離了價值的這一本質含義去大談所謂價值，就很難保證不離題。勞動價值論提出的價值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勞動”，這實際上與價值本義毫不相干。

勞動價值論の創立者和繼承者均沒有關於價值本義的具體概念。勞動價值論之所以提出“價值是勞動量”，並不是從價值本義出發提出的研究成果，而是從商品交換等量關係出發而作的邏輯推演。自從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提出“商品具有使用與交換”兩個用途的概念后，人們一直在試圖尋找交換の等量關係和計量標準。由於各種不同的商品無法以統一的物理量來計量，因而一直使人們對交換の等量計分標準深感困惑。後來終於被威廉·配弟^①等人發現了勞動產品都經歷了一定的人類勞動，並且發現了同一生產條件下勞動時間與產品增長の正比關係，於是宣稱找到了等量交換の統一標準，並認為勞動量就是價值量。這一發現似乎給人以巨大啓示，於是長期沿用這一概念。

^① 威廉·配弟——Petty William（1623 - 1687）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